

# 先父臧启芳堂堂中国人

作者：臧英年

(上接2018年7月6日第B4版)

1955年东海大学在台湾台中创立，先父应聘前往任教。东海大学是先父生前最喜爱的一个地方。那里有圣地灵山的环境，适于老人家居住，又是一个百年树人的高等教育学府，适为先父一生一世以作育才为己任的向往之所。先父常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之至乐也。”又说：“我一定以我的余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这是国家强大盛兴的基础事业，也是我决心为国效力的唯一方向。”

先父在东海教书，也兼任经济系主任职务，一面教学和忙于系务，一面又从事著述工作，将自己在1925年翻译出版的美国韩纳着《经济思想史》一书，根据其最新版的内容加以整编。为了赶进度俾能早日完成，这份工作也着实费了先父不少精力。他常常在白天忙了一整天，夜晚又继续著书工作到深更半夜。家母看他工作太吃力了，常劝他不要过劳，先父便回答说：“我每天有预定的进度，白天忙于其他事物，抽出的功夫不多，晚上的时间就不能不利用了。”这样，半年下来，先父的健康情形每况愈下，直到1958年春天，症状发作而卧倒病榻了。

先父卧病时间足有一年六个月之久，平素没有积蓄，治疗期间需款尤多，这时全赖先父老友等的经济帮助，才能支付开销，脱离困境。其时，东海大学校方和师生同仁们对先父的许多支援也是至深至切，难以尽书。在东海大学有许多已经归主的眷属夫人们，都常为先父祈祷，盼上帝赐福。先父也由此皈依了基督，获得安慰。先父病况最严重的时候，凯年弟曾辍学一年，回家服侍先父。他向学校请求休学之前和我商量，并没有预先禀告父亲，因为我们知道他刚强的个性，总是一切苦难自己承担，尽管他确实需要子女的奉侍，也决不肯因此让子女们荒误学业。1962年2月28日先父因心脏病突发不治，在东海大学住所去世。

先父在台生活的最后12年里，我已长大成人，有不少机会亲聆他老的教诲，和目睹其处境。有几桩耳闻目睹的事就此一谈。

一是，先父在台湾主办杂志时，有一位经常投稿的作者是时任立法委员的马乘风先生，他笔锋犀利，论政深刻，主张台湾应逐步走上民主政治之路。不幸他经人举报，以“匪谍”之罪名送入牢狱，下落不明。其后先父接到公函，蒋介石接

见，要听先父谈谈台湾社会现象和民间舆论。先父在被接见时间起当时下落不明的立法委员马乘风的情况，并告诉蒋，社会上对此案众说纷纭，反应不佳。老蒋立即脸色大变，十分气愤地说：“不了解情况，不要乱问。”会谈也就此结束。

二是，有一位东北籍的刘博崑立法委员，在一册个人藏书的某页上写下“蒋某未必有此雅量”的眉批。是比较毛泽东以往一事而言。此书由邻居借去阅读，其人后来和刘委员反目失和，将该书送呈老蒋。蒋氏阅后龙颜大怒，降罪于刘，立即革除了刘博崑的立法委员职务。蒋无雅量之说由此证实。

三是，蒋介石在台湾过七十诞辰，放言希望各方人士以进言代替庆祝。先父写一文发表，建议蒋氏要“减忧节劳”，不要大权一统，操劳过分，也不要事必躬亲，日理万机。其结果便是忠言逆耳，得罪于他。

四是，台湾《自由中国》刊物创办人雷震先生在台主张由部分国民党人士和其他党外人共同创办一个“新党”，以发挥对国民党监督和竞争的双重任务。蒋介石大怒之下，于1961年9月下令将雷震押解入狱，借口是《自由中国》杂志言论歪曲，动摇国本。其后由胡适先生在国外发起，要营救雷震先生出狱。国内外共有20多位学者和知名人士签名投书，先父是其中之一。据说，该请求书引起蒋氏万分震怒，撕为粉碎，投掷地上。雷震入狱也坐足了10年之期，才获释放。因此，先父也登上了蒋氏的“黑名单”。转年2月28日先父在东海大学因病逝世，其毕生“公务员”的身份竟不能获得台湾铨叙部的认可，遗属应获得的抚恤金也分文不发。

总之，以上种种事例都说明和突出了一个现象和问题，那便是：以言犯上，罪加一等；仗义执言，谈何容易？再有，拒纳忠言便是家国败坏的先声和后果。

对于年青人，先父总是极力鼓励他们要敦品励学，充实自己，好作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先父对我们讲：“有能力，无抱负不成；有抱负无能力，也不成，必要两者兼备，才能为国家出力。”又说：“年青人必需在古人和今人中取法一两个人，作为个人处世为人可靠而良好的标准。”先父一生最佩服的师长是王云五老先生，一生最推重的古人是汉末的诸葛武侯。据先父讲：“王老先生是苦学成名，学贯中西，忠公体国，品德高尚的

忠厚长者。诸葛先生是竭智尽忠，澹泊明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之士。”又说：“史可法、文天祥等人大难不苟，从容就义的一瞬间表现，乃是他们一生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自然结果，是由来已久和水到渠成的事。一个一辈子见利忘义唯唯诺诺的小人，在国有大难之时，绝不会顿然醒悟为国捐躯，这和一个一辈子忠公体国，大义凛然的志士之必然要成仁取义、为国效死，是同样的道理。”

对去机场或去车站迎送达官贵人的事他绝少去做，认为这多是迎送如仪，缺少真情，不需要自己再去凑数了。这桩小事也表明了先父为人态度的一面。

先父存心宽厚，古道热肠；尽管外表俨然，而内心热情如火。先父有了烦恼困难总是个人一力承担，绝不愿因自己情绪的低落而影响到别人。对于任何亲友、学生乃至素昧平生登门求助者的困难，却会视同自己的困难一样，一定全心全力为人求解。因而，先父在世之日，助人一臂之力的举动经常出现。

有人求先父帮忙，他若无能为力，便一口回绝，从不加以敷衍。我问他老何以如此，为什么不圆滑一点，说些动听而无济于事的话去应付这种场面？先父则说：“记住，英年，当你确实不能为人尽力的时候，必需要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白白让人家抱了一阵空希望，岂不是未助之反害之了吗？就如同：对于一个垂死的病人，我们应该尽量说些好听的话去安慰他。但对于一个本来可能医好的人，如我们医术不济，我们绝不能冒充良医，耽误了他挽救的时机，必需直截了当的告诉他，自己医术不行，请他另就高明。”

**尾语：**先父安息于台中东海大学附近山坡地段风景幽美的台中公墓，迄今已56年。1972年2月下旬美国尼克松总统前往大陆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上海公报”。尼克松总统成行前我便开始在美国新闻媒体（电视和报刊）和公众场所公开发言，力挺华府与北京关系解冻和进行建交的行动，认为这是惠及双方和



▲作者在其先父追思会上讲话

国际大局的必要措施和明智之举。因此，我立即被台湾执政当局视为“叛逆”，迅速列入了禁止入境黑名单的前列，持续26年，直到1993年才解禁，其后我才得以入境台湾，前往台中先父公墓祭扫。

2012年2月下旬，在先父逝世半世纪后，他的子孙辈和各界人士在美国旧金山市（1919年先父在该地加州大学勃克里分校就读研究所）举行了一场追思先贤臧启芳先生的纪念会，会中有多人发言，对先父的高风亮节、毕生奉献各抒其见，这正是“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先父启芳公一生奋斗和努力的领域是作育英才、舆论报国和全力促进自由民主国家体制的实现。

如今中国一定要励精图治、体制改革、振兴民主、言论自由和认真推动尊重人才，彻底贯彻以人为本、科教兴国和鼓励创新的国策，有妥善的通盘计划，有充分的资源支持，有贯彻实施的决心和行动。

当前，中国人民要接受号召，实现其“中国梦”，求的是安居乐业，平安是福。而国家领导也必须责无旁贷地去创造一个和谐、和平、和乐的社会环境，和清新、优美、安全的自然环境，从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地获其利、天得其时，让中国人有更佳的条件、士气和保障去实现他们的理想和美梦。届时，人人强，国家强；人人富，国家富。而此一顺序不能颠倒。

——完——

(未经作者或本报许可，不得转载。)